书评

以社会政策为中心的社会治理体系

——评《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

蒙　克　汪佩洁*

岳经纶、邓智平（2017）. 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共249页.

社会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项短板，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明确了经济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核心地位，社会治理长期处于经济建设的从属地位。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衍生问题与社会复杂性同步增加，社会治理难度日益攀升，对国家的治理能力提出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充分预示社会治理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将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所谓社会治理，本质上就是国家对社会领域的管理。采用“治理”的概念则更加强调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的价值导向。社会治理的内容纷繁复杂，但大多都离不开国家对保障改善民生、实现社会安定和谐的期许。根据岳经纶和邓智平的定义，社会治理是以实现和维护人民权利，特别是社会权利为核心，通过发挥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的作用，积极应对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完善社会政策，提升人民福祉，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包容与和谐发展的过程（第5页）。

面对问题与矛盾丛生的社会领域，学界围绕社会治理展开了热烈讨论，研究成果涉及国家社会治理制度改革（丁茂战，2009）、社会领域各项问题及政策

* 蒙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汪佩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养老、变业和家庭政策统筹协调机制的研究”（16CGL045）、清华大学自主科研基金“中国女生劳动参与率和总和生育率关系变动（2015THZWJC09）”、唐仲英基金会“仲英青年学者”计划。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建议（李培林，2014）、以社会组织为导向的社会治理（王名，2014）等多个方面。岳经纶与邓智平两位学者则另辟蹊径，从理论涵养丰富的社会政策领域吸取经验，深入研究了以社会政策路径推动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一书集中探讨了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的辩证关系，阐述了我国的社会治理必然要以社会政策为中心的核心论点，全书不但有较为深厚的理论关怀，着重辨析有关中国福利国家的论争，也贴合实践经验，对我国社会治理领域存在的现实问题与制度设计进行了评析。

接下来，本文基于全书内容对社会治理的若干问题进行梳理：第一部分展现本书核心观点，即以社会政策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的逻辑架构；第二部分梳理本书其他重要内容；第三部分将本书置于研究社会治理与福利国家的文献传统中，考察该书的学术贡献及其局限；第四部分提出今后我国社会治理与社会政策领域尚需研究的重要议题。

一、社会治理创新路径：以社会政策为中心的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被提上国家议事日程之后，如何推进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成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本书主张从社会政策的路径推进社会治理，并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证。

第一，社会政策是社会治理的必由途径。学界关于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主要有五类观点，分别是通过社会控制、公共服务、社会组织、国家建设和社会政策这几个途径推进。其中，社会控制就是维稳路径，其反映了我国社会稳定形势日趋严峻的现实压力，也正是国家开启社会管理的出发点。体现在制度层面就是由政法系统负责以维护社会稳定为中心的社会治理工作，将社会管理等同于维稳或管控。这一路径将国家与社会主体对立起来，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因而存在“越维稳越不稳”的状况，从根本上制约了社会治理的效果。其次，公共服务路径的社会治理本质上是一场政府改革（周红云，2011），将国家的社会治理工作落实到公共服务和转变政府职能的政府改革，是以政府管理理念和工作方式转变为核心的治理路径。再次，社会组织路径强调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作用，使其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这一路径认可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关键地位，但始终在国家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界定上存在分歧。最后，国家建设路径包含国家职能转变与国家能力建设两个方面，意味着国家一方面要更好承担社会管理职能，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社会的整合能力。

与上述路径不同，本书主张以社会政策的路径来推进我国的社会治理创新。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这并非否定其他路径的社会治理作用及成效，五种治理思路可谓是殊途同归，但从逻辑顺序与治理层次考察，社会政策处于所有路径的节点位置，可以将其他路径串联起来，达到综合的治理效果。具体而言，首先是社会政策本身就具有社会控制的功能；其次，社会政策的执行往往体现为公共服务的供给，同时，公共服务的提供离不开社会组织的递送；最后，社会政策的发展，特别是福利国家的形成本身就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第 30 页）。这样一来，社会政策正是社会治理较为理想的途径。

第二，社会政策是市场经济体制得以成功运行的基本条件（第 44 页）。这体现了以社会政策为中心进行社会治理的理论支撑和必要性，也是本文的论述重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在政府治理、市场治理与社会治理三方面有所作为。市场治理的效果离不开社会治理的配合，这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改善民生与经济发展的有机统一已经成为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换的内在要求（蒙克、汪佩洁，2018）。市场作为最高效的资源配置手段，其最大特点就是将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一切都商品化，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的迫切性，但参与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及社会冲突，从而威胁市场经济体系的有效运转与社会稳定。因此，为了满足弱势群体的需要，巩固市场经济发展成果，发展社会政策就成为了必然选择。正如 波兰尼（Karl Polanyi）（2007）所言，社会政策就是与市场相对的一种保护主义反向运动，其实质就是要通过社会政策的手段进行一定程度的“去商品化”。所谓“去商品化”，指个人福利既独立于其收入之外又不受其购买力影响的保障程度（艾斯平－安德森，2003），以纠正市场经济的天然缺陷。按照这个逻辑，市场经济发展越充分，越需要大力发展社会政策来保障市场经济的持续性，这与社会保障拖累经济发展的传统观点完全相反。对此，蒙克（2017）通过增长、就业和价格水平三方面论证了社会保障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而优良的政策配套与制度设计则是成败的关键。按照本书的表达，社会政策不仅成就了市场经济，而且驯服了市场经济。因此，我国以市场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决定了社会政策必须处于与经济发展的平行地位。从宏观治理层面来看，社会政策的重要地位及其功能决定了其必将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核心。

第三，国外社会治理经验与我国社会现实表明社会政策是社会治理的必由之路。一方面，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遭遇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时，主要是通过发展社会政策与福利国家建设来加以应对，但没有提出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的概念，可见社会政策在西方语境之下可以等同为我国的社会治理；发展型国家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如韩国的经验也表明社会政策是新兴经济体重要的国家治理工具（第 8 页），韩国在民主政体建立并巩固后，开始对底层声音表现出更高的回应性，构建了具有普惠性的福利国家，完成了全面的现代化国家转型。另一方面，我国在短短几十年的市场转型期遇到了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思潮扩张的国际背景，加剧了全社会对福利政策的负面印象（第 45 页），对发展社会政策多有顾虑，这是我们迟迟没有进行社会政策扩张的原因之一。但是，社会发展长期落后于经济发展，这一短板导致了社会建设的虚弱无力，社会治理效果必然大打折扣。本书提出，我国社会治理长期落后、社会问题丛生与我国社会政策不健全、社会政策长期以来沦为经济政策的附庸有密切联系（第 10 页）。因此，在社会治理难度与复杂性加大的现实压力下，社会政策不能继续处于缺位状态，以社会政策为中心的社会治理，不但是国际经验的总结，更是中国国情的大势所趋。

二、社会治理创新图景：中国社会治理的出路与实践

在论证了我国社会治理要以社会政策为中心的核心命题之后，本书进而回答了我国社会治理亟需面对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理论上，中国社会治理的出路是什么，是否要走向福利国家，走向什么样的福利国家；实践中，如何运用基层经验、传统文化进行社会治理创新，以及如何突破社会治理的体制困境等。

（一）以社会政策为中心的社会治理出路：中国特色福利社会

以社会政策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意味着社会政策将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政策工具，是国家整合社会力量的重要支点。自然地，社会政策的突出作用将体现为社会政策的扩张，而将社会政策作为国家重要职能的体制就是福利国家。因此，随着 21 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政策的一轮扩张，围绕中国是否应该建立福利国家的争论便不绝于耳。

学界多数观点对我国建立福利国家的前景持消极态度，[①] 本书看法则与之相反，作者强调福利国家的发展在中国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首先，中国要不要建设福利国家取决于对福利国家的认识。为正本清源，本书考察了西方福

① 有关中国是否发展福利国家的论争主要分为乐观派与悲观派两类。乐观派的代表包括王绍光（2013）、杨大利（Yang，2004）等，悲观派的代表包括郁建兴和何子英（2010）等。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利国家的概念与发展历程，并开创性地指出，福利国家首先是一种福利态度，其次才是福利程度（第53页）。从这个视角出发，我国建立福利国家本质上体现了国家承担的社会责任，并不等同于高福利。同时，福利国家强调政府承担对公民的社会责任，化解系统性社会风险，保障人民的基本福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进一步佐证了我国建立福利国家的必要性。关于这一点，本书的态度非常明确，甚至援引了奥菲（Claus Offe）（2011）振聋发聩的原话“尽管福利国家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影响很可能是破坏性的，但废除福利国家所带来的影响将简直是毁灭性的”（第62页）。

其次，中国能不能拥有福利国家，建立起统一的福利社会制度，取决于国家意图、政策能力和社会压力三个层面。本书认为，这三个要件在中国正处于积极扩张之中（第86页）：执政治国理念逐渐向民生倾斜、社会政策覆盖面逐步扩大、福利国家要素基本建立，以及公众对福利需求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这些都预示着中国建设福利国家的未来可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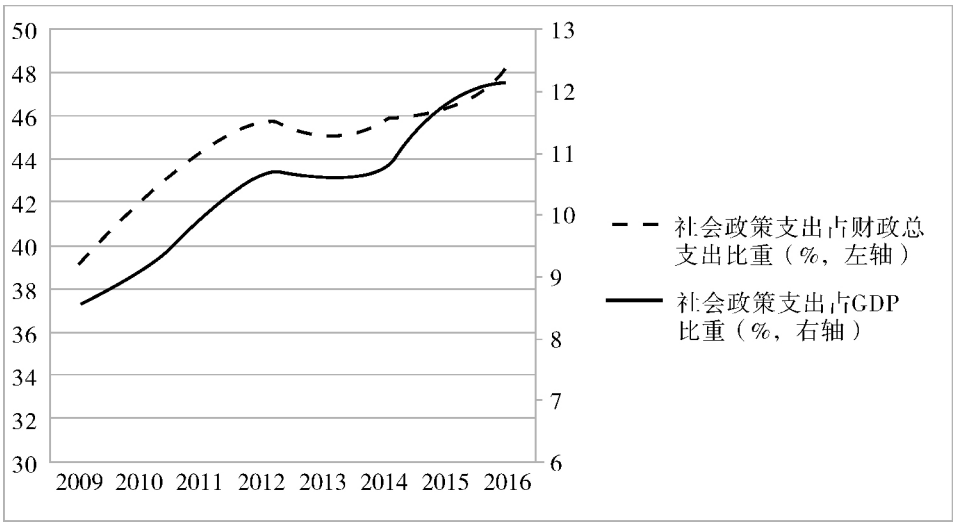

图1　我国社会政策支出占财政总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比重（2009—2016）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部。

事实上，从中国社会政策的支出水平及其与发达国家的国际比较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社会政策扩张已经在客观上引领中国初步进入福利国家的序列。尽管学界对福利开支这一标准持不同意见，但其仍然是当前福利国家研究中最具有操作性、代表性的衡量指标，无论是国家意图、政策能力还是社会压力维度，最终都将体现在国家的福利开支水平上。而中国社会政策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在逐年攀升（图1），并以占发达国家四分之一左右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保证了占国内生产总值12%（2016年）的社会政策支出（图2），这些都体现了中国社会福利扩张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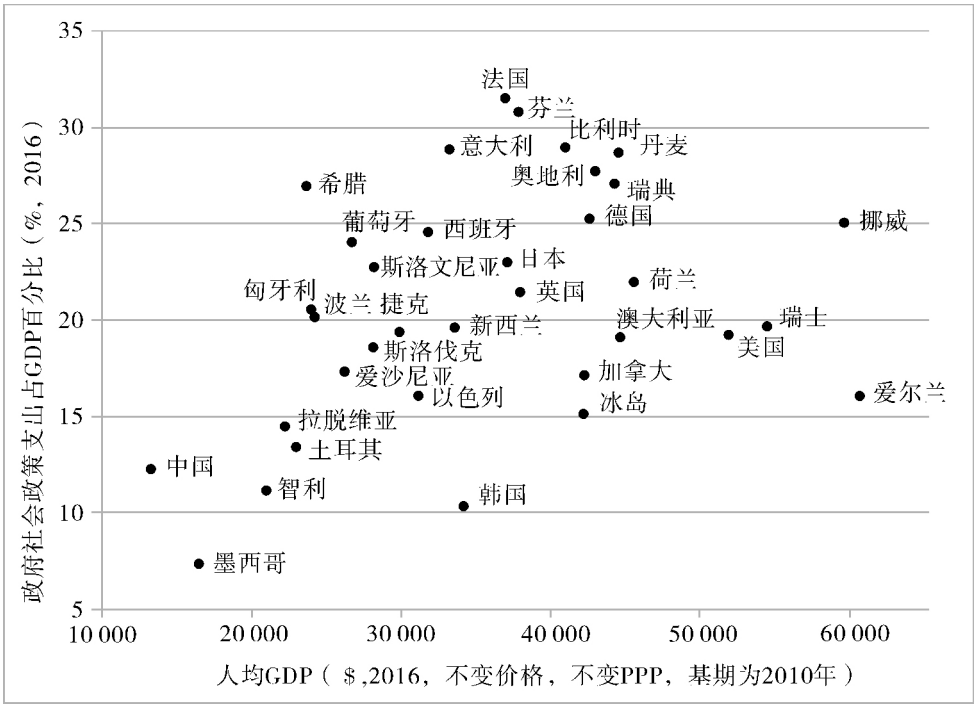

图2：社会政策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跨国比较（2016）

资料来源：中国数据来自中国财政部；其余国家数据来自经合组织国家数据库（OECD Stats）。

最后，本书提出了中国福利国家的图景，那就是建立一个中国特色的福利社会，既不走西方福利国家的模式，也不回到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大包大揽的状态，而是走“第三条道路”（第50页），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载体，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设计社会政策，发展积极性福利，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

（二）以社会政策为中心的社会治理实践：广东经验

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学界已经达成一致共识，但如何推动社会治理实践与创新是理论界才开始探索的议题。对此，本书尝试提出了一个社会治理的行动框架。在这个框架指导下，结合全国性社会治理难题与广东社会治理经验，探讨社会治理实践中的若干重要议题，以及社会治理的领导体制困境。

社会治理行动框架提出，社会政策要以人民基本需求和公民社会权利为出发点，通过扩大公民参与，发展社会保护体系与社会组织，从而达到增进人民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福祉的目标（第33页）。这一行动框架在本质上是对我国社会治理问题从理论基础到政策落实、从制度建设到治理目标的一种系统性表述，有助相关方在社会治理上明确底线、掌握方法、落实目标。实践上，本书探讨了我国普遍存在的社会治理问题，如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究竟是独立还是嵌入，中国劳动关系和慈善事业的困局，并结合社会政策与福利国家的建设进行了问题剖析。此外，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前沿与市场经济最活跃的地区，率先进行了社会治理的创新和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此，本书全面汇总了广东社会治理经验，并突出社会治理的基层导向，通过广东的社区建设、农民与农民工的地域社会权利重构等案例向读者展示了社会治理的基层真实图景。值得强调的是，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整合社会力量的方式，其根基在基层，实践在基层，因此创新活力也在基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基层实践，大胆放权，鼓励基层在社会治理创新上走出新路。最后，作者敏锐地察觉到社会治理的体制困境，通过对国家进行社会管理（治理）的主管部门——政法委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这一机构的几度易名和机构调整的梳理，判断我国社会治理的领导体制存在一定问题。这一方面表现为“综治委”职能单一，扩权后又无力承担庞杂的社会治理功能（第232页）；另一方面也表现为社工委作为新兴社会治理部门，在创新过程中的艰难历程（第244页）。因此，基于社会治理的机构分析，本书认为社会治理亟需顶层设计。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不仅缺乏价值共识，在体制设计上也远远落后于政府治理与市场治理，这是我国社会领域问题多发、复杂性难以破除的体制成因。

三、本书所处的文献传统及评价

“治理”是新近的公共管理概念，“社会治理”更是一种中国话语。如果将社会治理的研究议题置于于整个社会领域的研究脉络中，并不能找到完全对应的文献传统，但从社会治理旨在应对的社会问题与社会风险出发，其与福利国家和社会政策的关切则不谋而合。因此，社会治理这一全新概念，实际上是社会政策研究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一种体现。本书论述的核心观点——以社会政策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正体现了对这一研究传统的呼应。接下来，对本书在这一研究脉络下所处的位置予以评判，并讨论本书的贡献与局限性。

福利国家是对发轫于西欧的社会经验总结。因此有关福利国家与社会政策研究的一般理论均具有浓厚的西方色彩。例如，艾斯平－安德森（Cøsta Esping－Andersen）（2003）的巨著《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开创性地以国别为单位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对西方福利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展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福利体制的多样性。卡佩莱蒂（Mauro Cappelletti）（2000）从法律正义的角度对福利国家展开研究，将福利体制对社会公正的价值追求置于最高地位。此外，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2011）、希尔（Michael Hill）（2003）等对社会政策的历史、内容等进行梳理，迪安（Hartley Dean）（2009）在《社会政策学十讲》一书中确立了社会政策以人类福祉为目标的价值理念，对社会政策与福利国家的最终社会关怀进行定性，并提出了社会政策研究的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三类研究传统，上述这些努力共同建立起社会政策与福利国家的一般性研究框架。此后，随着新自由主义转向与紧缩政治的来临，以及全球化所触及的社会问题，福利国家发展遇到了挫折（考夫曼，2004），基于这一社会现实，学界将研究目光转向了后福利国家的出路与改革。

与西方福利国家成熟的发展经验不同，发展型国家由于在经济建设上处于后发阶段，其社会政策与社会建设也相应地晚于传统福利国家。其中，又以东亚模式的特征最为鲜明，通常被贴上“儒家主义”“生产主义”等标签。这一研究领域文献不多，且主要集中在韩国等地区（Goodman et al.，1998）。此外，日本虽然较早地进入工业社会，但植根于东亚儒家文化的日本福利体制也与西方模式大相径庭（武川正吾，2011）。总结起来，根据本书的观点，发展型国家的社会政策是由政府强力推行，始终处于经济发展的附属地位，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性作用而存在的。

中国社会政策研究起步更晚。尽管中国是典型的发展型国家，但由于政治体制的特殊性，中国的社会政策发展曾经历过反复的调整与回潮，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政策才集中显示出了发展型国家福利体制的特征。这一方面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成果较多的、从社会结构变迁研究中国社会政策发展的文献。郑功成（2008）以中国社会保障的30年历程为立足点，将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定位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福利社会，并指出与经济增长奇迹相对应，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将是社会发展奇迹的主体标志。李迎生（2015）关注社会建设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并考察了中国建设社会福利制度的创新路径。另一类文献从社会治理角度出发，探讨了我国社会治理的内容与可能性，如王名（2014）认为社会治理应当以社会组织为突破口，郁建兴（2012）和燕继荣（2017）关注地方社会治理经验，从协同治理的角度探讨了基层社会治理思路。

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政策、社会治理的文献分别沿着两条独立的路径行进：社会政策以社会保障的发展为主线，社会治理则以国家治理体系为出发点，彼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此各自为政。此外，关于社会治理或社会政策体制机制的研究更加少见，这些都是过往研究中的重大缺憾。仅有个别文献简要探讨了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例如张林江（2015）提出社会政策应当成为社会治理的政策工具，虽预见到社会政策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与本书核心观点逻辑一致，但对社会政策的定位仍然停留在工具性层面。岳经纶（2014）在《社会政策与“社会中国”》一书中以中国社会政策的历史发展为主线，论述了社会政策在社会管理体制中的作用，并表达了构建一个以公民社会权利均等化为基础的“社会中国”总体愿景。直到《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一书，可谓及时打通了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研究之间的鸿沟，从社会政策的角度论述社会治理的可能性，也是对社会治理核心问题的回归。本书的具体贡献主要有四方面：第一，提出中国社会治理要以社会政策为中心这一观点，并予以周密论证；第二，明确中国社会治理的出路在于中国特色福利国家，回应了关于中国福利国家建设的争论；第三，提供了丰富的基层社会治理案例，对全国性社会治理工作的开展具有启示参考意义；第四，首次研究了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问题，将社会治理的机构研究提上议程，弥补了这方面文献的不足。

当然，由于本书是作者关于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研究的文集，不能对这一议题进行系统和深入的讨论，因此存在以下几点局限。首先，本书虽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必然走向福利国家的论点，但缺乏对国家面临的宏观社会经济等结构性问题的解释，而这恰恰是我国进行福利国家建设的根本动力，也是社会治理的首要关切。其次，作者描绘了中国特色福利国家的样貌，表示未来的福利体制走向是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要实践形态的制度模式，并没有突破西方统一的社会公民身份理论，也不足以回答中国特色福利国家的“特色”之处。最后，本书还缺少从发展的视角讨论中国特色福利国家可能面临的挑战。

四、讨论：迈向中国特色福利国家的研究纲领

中国的福利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其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在国家治理体系的三大子系统中，社会治理是短板最明显、问题最突出的领域，而以社会政策为中心的社会治理路径，决定了中国福利国家建设将成为大势所趋。当前，我国的福利国家建设尚处于早期阶段，可以预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福利体制的逐步建成，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将得到显著提升。《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是探讨将社会治理与中国特色福利国家进行统一研究的一次有益尝试，基于这一类文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献成果，今后中国社会治理与福利国家建设的研究将具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基于本书的研究缺憾与启发，本文先尝试提出三个方向的研究纲领:

第一，当前中国特色福利国家与社会治理的研究，多以基层经验为主，但缺乏顶层设计。尽管多元福利主义和社会治理体现了多主体参与、共责理念，但我国福利国家的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开展始终是在国家的统一布局之下，因此，不能绕开领导体制空谈社会治理，后续研究可以重点关注中国社会治理的体制研究，并将重心倾斜在国家顶层设计上。

第二，基于中国社会实践与理论发展，科学地提出中国特色福利国家的“特色”之处，明确中国与传统福利国家、典型发展型福利国家的异同，并将这一研究成果置于全球福利国家经典理论、发展型福利国家以及比较社会政策的文献脉络中。

第三，历史地、动态地看待中国福利国家的发展，关注中国福利国家的前景与可能面临的挑战。西方经验告诉我们，福利国家的发展并非一片坦途，面对不确定的内部与外部环境，福利国家也必须不断进行自我更新和调适，就如迪安（2009）所言，社会政策学中并不存在单一正统。因此，关于中国特色福利国家与社会治理的行动框架并非一成不变，有待于今后不断发展与完善。

参考文献

丁茂战(2009). 我国政府社会治理制度改革研究.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弗兰茨－克萨韦尔·考夫曼(2004). 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 王学东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哈特利·迪安(2009). 社会政策学十讲. 岳经纶、温卓毅、庄文嘉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卡尔·波兰尼(2007). 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冯钢、刘阳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2003).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郑秉文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克劳斯·奥菲(2011). 福利国家的矛盾. 郭忠华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李培林(2014). 社会改革与社会治理.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迎生(2015). 中国社会政策的改革与创新.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理查德·蒂特马斯(2011). 蒂特马斯社会政策十讲. 江绍康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

迈克尔·希尔(2003). 理解社会政策. 刘升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蒙克(2017). 促进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 人民日报·理论版. 3月28日.

蒙克、汪佩洁(2018). 应对新考验，不断取得高质量发展新进展. 人民日报·观察版. 4月8日.

莫诺·卡佩莱蒂(2000). 福利国家与接近正义. 刘俊祥等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王名(2014). 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王绍光(2013). 中国仍然是低福利国家吗? ——比较视角下的中国社会保护"新跃进".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2: 70-94.

武川正吾(2011). 福利国家的社会学. 李莲花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燕继荣(2017). 走向协同治理.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宁波探索. 北京: 人民出版社.

郁建兴(2012). 让社会运转起来.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郁建兴、何子英(2010). 走向社会政策时代: 从发展主义到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建设. 社会科学, 7: 19-26.

岳经纶(2014). 社会政策与"社会中国".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岳经纶、邓智平(2017). 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张林江(2015). 社会治理十二讲.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郑功成(2008). 中国社会保障30年.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周红云(2011). 社会管理创新实质上是一场政府改革. 领导之友, 6: 19-20.

Goodman, R., White, G. & Kwon, H. J. Eds. (1998). *The East Asian Welfare Model: Welfare Orientalism and the State*. London: Routledge.

Kwon, H. J. Ed. (2005). *Transforming the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 in East Asia*.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Yang, D. L. (2004). *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ance i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innovation space. The EHA analysis of policy diffusion of MLSA rules show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strategically carried out social policy innovations to cope with changes of vertical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in the policy cycle. The innovation pioneers who have promo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entral policy are more likely to adopt policy rules with a different welfare concept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and the degree of this influence depends on the level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between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governments.

Key Words Policy Innovation;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Welfare Concepts; Urban Minimum Living Standard Assistance Policy

●THEORETICAL REVIEWS

Representativeness Study of Case Study: Categorical Review and Replying Way – out
..... Dongxia Zeng & Haiun Dong

Abstract The case study is an important and commonly used research method. The representativeness of a case study can achieve significance based on its generalizability in two senses: sample representativeness and generalization representativeness. A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f the representativeness of the case stud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arguments: irrelevance, classification, and transcendence. Representativeness irrelevance theory is unable to bypass the demand for generalization. Classification theory is unable to escape the logical risk and small probability of disproof trap. The diffraction theory of transcendentalism pursues the force to overcome gravity by oneself and circumstance transcendentalism theory is in fact the opposite of generalization. In short, the existing research doesn't respond validly to the question about representative problem of case study. To meet the challenge of the representativeness problem of the case study, we should break out of the single – study mindset and accept the case study's generalization problem while conducting further research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generalization problem.

Key Words Case Study; Representativeness; Categorical Review; Research Methodology

●BOOK REVIEWS

The Social – Policy Approach to Social Governance: A Review of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Governance*
..... Ke Meng & Peijie Wang
Governance Logic of Big Countries' Health Care Reform: A Review of *Health Care System Innovation in China: Policy Experimentation for Health Governance*
..... Alex Jingwei He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